

现代乡村教育实验者们的迷茫： 他们想送理想 可农村想要钱

7月9日，邱建生边接着电话，边给往来的乡亲打招呼寒暄。刚结束了在福建省兰溪县中学教育的调研，回到上杭县的老家，邱建生觉得格外踏实。

上个月，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总干事邱建生每天驻扎在福建省的乡村，走访、听课、聊天。“现在乡村教育真的很差。”邱建生叹了口气，很多孩子要去二十多公里远的地方上学，一所乡村学校只有几个教师留守，这一切问题，都会导致越来越多的孩子没有上学。

本报记者 陈玮 张亚楠



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核心团队。(资料片)

赚不了钱的精神有啥用

1996年，邱建生看到一本题为《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》的书，正是这本书改变了他的人生。从1997年开始，他在家乡福建和北京等地奔走，发起成立“晏阳初研究会”。2003年，“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”在河北定县翟城村成立，邱建生请缨成为学院的总干事。

他们的设想是，建立社区大学，做成人教育，教给他们合作方式和农业技术。通过试点，促进经济合作组织，让农民联合起来抵御市场风险。

在邱建生看来，那时候是乡村建设的高峰期。上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，家庭承包制全面推行以后，暴露出的“三农问题”日益加重。“农村三要素大量外流，造成农村凋敝和衰败。”邱建生说，那时候有很多人回到乡村，谋求怎么解决问题。

然而，喧闹的开场，却迎来了一个暗淡的滑落。到了2005年，蜂拥听课的村民，先是变得三三两两，然后就是连会都开不起来了。村民们认为，这些“有知识的人”到来，会马上带来经济收益，然而，他们等来的不是项目引进，却是学校。

在邱建生的理念中，办成人教育培训、组建文艺队，是为了维系乡村守望相助的精神，在文化建设中逐步推进经济利益。但是，这个过程农民们等不了。

“回到家乡，当乡亲们知道我一个月只能赚到3000多块，都说我笨，同时夸奖着没上过大学，现在却赚大钱的弟弟。”山东省茌平县教育局副局长石绪军说，经济大潮下的时代，已经跟过去不一样了。

邱建生说，很多政府部门也不理解，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会带来怎样的效果。“没有持续性。”邱建生说，曾经有一个社区大学，在当地一位政府官员的帮助下建立起来，当那位官员调离，项目就停止了。“目前来说，自发的乡村教育建设都是个人行为，没有政府资

源与社会资源的合力。”在这种情况下，邱建生在全国建立的实验点，最后只剩下9个。

一厢情愿地给予

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觉得，邱建生想法很好，但缺少“帅才”，账管得很乱。很多志愿者的方法也有问题。在培田村，一位大爷正在忙着烧火做饭，志愿者在旁边不停地劝说他加入文艺队，口若悬河地说着文艺队的好处和集体的价值，被叨叨烦了的大爷很快呵斥，拒绝了。

很多专家不愿意驻扎在村子里。“这个社会站在农民的视角考虑问题太少，研究问题的多，解决的太少。”邱建生说，即使是厦门大学的教授们，也没几个人肯花半小时时间，去看看那些寂寞的村子。

如今，邱建生也在谋求转型，在培田村的实验点，邱建生与工作人员带着农民一起边学习边创业。“看看能不能有收益。”他们一直探索着如何增加乡村收益，适应农民的需要。

石绪军说，其实很多人并不知道乡村教育真正需要什么。前两年，北京有一个教育项目，让名师把课程录下来，通过网络、光盘的方式送给乡村，并免费给这个村送了5台电脑。“乡村老师水平低，电脑摆弄半天不会用，现学都没人教。而且，电费谁出？教育经费这么紧张，根本没有多余的支出。”石绪军说，现在更多的帮助是一厢情愿地给予。

但是，乡村教育也有成功的例子，比如北京十一中学校长提出的“走校制”，教师驻扎到村子，将先进教育理念带给村里的老师，等传递得差不多了，再撤回去。只是这个过程需要政府参与、社会资源的调动，以及一种沉下心来解决问题的勇气。

当问到邱建生关于乡村价值的理想什么时候会实现，邱建生笑了，说：“一百年说不定吧，其间还会有倒退和停滞不前。”

但是，从美国引进的优质“脱丽斯”棉花，很快被广大农户接受。1932年，邹平第一家美棉运销合作社成立了。所有农民都可以加入合作社，可以从合作社贷款或者借贷“脱丽斯”棉种，生产出来的棉花由合作社统一收购，集中轧花、打包，共同销售。

把农村变成城市

除去晏阳初的建立村治体系和梁漱溟的文化革新，在600多家乡村改造实验团体中还有众多不同的思路。比如，教育家陶行知在南京晓庄推行“教育乡建”，他让孩子们回家给父母“上课”，希望这些孩子向乡村社会输送变化。外来传教士柏格理及继任者在石门坎尝试“宗教与科教乡建”。实业家卢作孚在重庆北碚推行“实业乡建”，试图以城市化、工业化发展农村。

卢作孚最初也是秉持“教育救国”理想，为此他担任泸州永宁道尹公署教育科科长和成都通俗教育馆馆长，大力提倡新教育，积极开展民众教育、通俗教育。然而，他这两次教育救国尝试都因“纷乱的政治不可凭仗”而被迫中止。从此，卢作孚抛弃教育救国理念，选择实业救国。他白手起家创建民生公司，十几年成为航运业巨头。1929年，他担任峡防局局长，开始建设北碚。

卢作孚的北碚建设从剿清盗匪开始。建学校，



朱琳：

文姬已归汉 贵妇还了乡

本报记者 张亚楠

她是《雷雨》里的鲁侍萍、《蔡文姬》里的蔡文姬、《虎符》里的如姬夫人、《贵妇还乡》里的贵妇……她就是“中国话剧皇后”朱琳。7月7日，92岁的朱琳因病去世。

朱琳从十几岁起就登上话剧舞台。1937年，抗战爆发，14岁中学生朱琳加入由中共地下党领导和组建的剧社，参加进步抗战戏剧活动，开启了她一生的戏剧生涯。1938年8月1日，15岁的朱琳在武昌昙华林参加了由周恩来、郭沫若、阳翰笙、田汉、洪深等领导的抗敌演剧队第二队。在抗敌演剧队期间，朱琳结识了周恩来。看到演剧队里有一名这么小的队员，周恩来特意交代要好好照顾小朱琳。

1941年春，朱琳参加了田汉创作的《秋声赋》的演出，在剧中担任女主角，并演唱了该剧的主题歌《落叶之歌》。

1952年9月，不到三十岁的朱琳调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。戏剧评论家董道明认为，“朱琳是北京人艺演剧体系中一位具有典范意义的女演员，她让我们认识到什么样的表演叫‘不可复制’。”

朱琳在北京人艺演出的第一部戏是曹禺的《雷雨》，她饰演“鲁侍萍”。这一年，她30岁。周恩来看过戏后让邓颖超给北京人艺办公室打电话，说朱琳有一句台词怎么没说。这句台词是：“凭什么打我的儿子！”朱琳告诉周恩来，因为一说这句台词，就跟说相声似的，观众就乐，一乐就破坏了整个场上的情绪。周恩来就说，“你要说得好，观众是不会乐的，你好好研究一下，演员对重要的台词要下工夫。”朱琳说，后来她慢慢地琢磨、体会，改变了说法，把握这一句人物的心理和感情。改变以后，观众再也没笑过。

上世纪50年代末、60年代初，在焦菊隐导演的三部曲《虎符》、《蔡文姬》、《武则天》中，朱琳成功运用了民族戏剧的美学精神，成为焦菊隐话剧民族化探索的实践者之一。她专门向京剧名家荀慧生等人学习。“光是一个脚步动作，她就学了小生、花旦、青衣的动作，然后摸索出适合蔡文姬的脚步。”看过她所饰演的蔡文姬后，郭沫若说：“朱琳同志演的蔡文姬能传神。”

退休后的朱琳对舞台仍旧念念不忘，在一次北京人艺老艺术家座谈会上，朱琳对时任北京人艺院长张和平说：有没有什么机会，有一个戏份不多、台词不多的角色让我演演，我还想再上台逛逛。2012年，近90高龄的她在北京人艺建院六十周年献礼大戏《甲子园》中扮演了“王奶奶”。首轮26场演出，她一场不落地全演了下来。首轮演出结束后，她还不过瘾，向编剧请求再加点戏。

修公园、办工厂、开煤矿、造铁路，慢慢的，北碚有了图书馆、医院、防疫所甚至科学院、博物馆。卢作孚是个实干家，北碚的很多建设事业都很好地利用了当地军阀，让他们出面、出钱。在温泉公园的募捐启事上，当年川系军阀众多首脑的名字赫然在列。

卢作孚认为，创办实业和乡村建设的根本都是人的训练，要提高人的素质。为此，他写了一本名为《中国的建设问题与人的训练》的小册子。蒋介石读到这本小册子，写信给卢作孚，称许他：“思虑周洽，所行办法皆井井有条，至为佩服。”短短几年，卢作孚将一个盗匪出没、混乱无序、落后贫困的乡村，变成了一个初具现代化基础的模范城镇。卢作孚的乡村建设实验是民国时期众多乡村实验中持续时间最长、成就最大的一个。全国解放前夕，他拒绝了国民党方面要他去台湾的多方劝说，千方百计将滞留在香港的20多艘民生公司轮船驶回大陆，参加新中国建设。不幸的是，1952年，卢作孚在家中自杀身亡。

关于城镇化和实业救国，还不得不提到吴景超。他主张大力发展城市，通过城市中工商业的发展，吸引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来到城市，成为市民，这样既繁荣了城市经济，又减轻了农村人口数量，使农民减轻负担。“让农民进城，成为市民”，吴景超的思路似乎与当下中国城镇化发展策略十分契合。